

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

● 林載爵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1988-)。

我們以身體接觸聲音：粗暴或溫柔
以靈魂接觸容顏：美麗或哀愁

以花交換草，以草交換星辰，
星辰映照海洋，海洋回溯大地。

我們以diversity取代solidarity
solidarity包容了diversity

在太陽 風 草原的聲音與容顏中
我們完成了交換與取代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下簡稱《台社》)創刊於1988年2月，這時候，像《夏潮》、《夏潮論壇》、《文星》、《南方》、《人間》等對正統不滿的雜誌，不是早已關門，就是幾近收攤。台灣的異類聲音在舊體制正要逐漸解散的時候，反而失去了舞台。《台社》的成立適時在台灣新舞台上拉起一支弓絃，不以雜文評論而以學院論文的樣式，奏起「知識上叛逆」的曲調。

《台社》創刊後，台灣步入了激烈變動的年代，我們嚐到民主的甜頭，但在一陣咀嚼之後，我們開始問：這就是民主嗎？能夠自省的反國民黨的年輕世代，從示威陣隊中退伍後，有着更大的失落感；這就是我們的歸宿嗎？國族浪潮，驚拍海島，波濤捲起處，「他者」驀然而立：這裏是我們的土地，外人不得入內打擾 (trespassing)。台幣升值，股價、房價狂飆之後期待的更大獲利，似乎機會不再，那段瘋癲的、美好的時光，換來的是午夜的夢魘。國土的釋放，讓財富重新洗牌，貧富不均更加擴大，勞工兄弟、受薪朋友經過原是農地的市郊，望着閃爍的霓虹燈，一棟棟矗立的高樓，心中一片茫然，他們的吶喊，現在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創刊後，台灣步入了激烈變動的年代，我們嚐到民主的甜頭，但在一陣咀嚼之後，我們開始問：這就是民主嗎？這就是我們的歸宿嗎？

過去解釋「台灣經驗」所根據的學術觀點，沒有一個是源自於台灣發展之具體問題所產生的問題意識而建構的。台灣的社會研究必須從台灣的現實出發，自我批判地去追問「我們是甚麼？」這個有着倫理實踐意涵的問題。

已經沉寂，這就是我們追求的發展嗎？競選宣傳車的擴音器仍然傳出高亢的呼喊：傾聽人民的聲音。

《台社》的出發點是，過去解釋「台灣經驗」所根據的學術觀點，沒有一個是源自於台灣發展之具體問題所產生的問題意識而建構的，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說明台灣的傳統社會如何趨近現代性。台灣的社會研究必須從台灣的現實出發，從歷史的一結構的角度，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調查研究，自我批判地去追問「我們是甚麼？」這個有着倫理實踐意涵的問題。幸虧有《台社》，在無所顧忌的年代裏，原來有所顧忌的輕微異音，還能繼續發聲，讓台灣的思想界還有一點批判性。

甚麼是基進的 (radical) 台灣社會研究？

1995年8月，在經過七年的變化與發展後，《台社》以編委會的名義發表了〈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第20期)，為《台社》的立場作了創刊以來最完整的論述。文中指出台灣欲建立新國家的努力，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走向，在意識形態上，新國家全面發展國家主義，其動員的策略則是以人民的名義，重建一套威權統治體系，這個體系可定性為「民粹威權主義」，它所制訂的各種霸權計畫，以「人民」為名要求共識，卻掩蓋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壓制了眾多的差異，並阻礙多元的社會發展，踐踏了少數族群與弱勢團體的權利，在族群關係上，漢人仍是居於支配地

位的優勢族群，在新國家裏，婦女仍然被制度性的歧視，階級問題仍然存在。但是在新國家的「人民主權」召喚裏，國家主權以及政治共識卻刻意抹殺人民之間的區別，使得實質存在的各項差異在政治上遭淹沒，淪為「平等公民」的神話祭品。在十一年的三十五期的篇幅裏，《台社》共討論了下面幾個問題：

國族主義：正視自由與族群兩種民族主義的危機，在肯定台灣需要一種團結 (solidarity) 時，也要以民主民族作為另類出路，同時跳脫國族主義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不從階級、性別及弱勢族群觀點來思考、建構台灣國族主義，卻單一的以族群、民族作為前提，是台灣國族主義論述的最大盲點。

甚麼是民主：在民主社會裏，難道只要政府體制解決了，社會和政治民主就形成了嗎？民主不止是關注形式和法治主義而已，更包括了個人智能的解放，積極的公眾參與。在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三種國家認同的內涵中，一個採用自由主義原則的民主制度，必然以第三個層面(制度)為其國家認同的主要憑藉。

發展問題：在全球經濟中，台灣在國際以及亞太分工中的可能位置。國家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國家又如何以集體力量替代尚未健全的市場制度，並進行對「商」的扶植，以及所造就的「官商資本主義」。

產業經濟與經濟組織：以石化業、自行車為例，說明國家機器在甚麼情況下，可以產生帶動產業的效果。台灣在逐漸變成技術密集產業出口類型後所面臨的資本外移與

勞動力移民的問題，以及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小頭家」的存活之道、家庭代工所反映的隱形工廠等問題。

婦女研究：女性勞動力在台灣經濟成長過程中擔任了重要角色，而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結合，強化了對婦女勞動力的剝削，女性的低酬勞動力被視為理所當然。

文化研究：跨國連鎖服務業侵入台灣市場後，牽動了台灣消費文化的發展，而知識份子面對由市場主宰的大眾文化時，優勢地位已逐漸消失。1989年以來，電視頻道開放所反映的問題是，不能只流於批判「黨國」，更要顧及商業利益(財團)所支配的廣電邏輯，及其所引發的不民主現象。

建築與都市：台灣的都市與區域空間問題必需放到台灣之邊陲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中才能了解，例如：台灣地區空間不均衡發展的癥結不在設施、人口、產業空間分布不均，而是社會生產關係不均衡造成的結果。

以基進自詡的學術工作者，能夠扮演甚麼角色？發揮甚麼功能？

《台社》的成員在七周年時自詡不僅是學院內外的學術工作者而已，更要透過參與各項社會政治運動，與台灣社會的成員共同努力改造整個社會。這與七年前創刊時所說的「着手去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間題的理論」，顯然已有很大的改變。學術研究與改造運動的結合是《台社》在當今台灣知識圈的最大特色，

《台社》如果有活力，這個活力應該就是來自他們的投入、參與所產生的動力。然而，如果改造運動受到挫折，或者找尋不到改造運動的明確目標，或者所投入的改造運動變質，或者因為投入運動而遠離探索，或者在改造行動中取得了權力，那又該如何是好？會不會再認為創建理論優先於社會改造，透過論述干預台灣社會就好了。

《台社》以明白宣告「沒有歷史感與整體意識，就沒有所謂的左派」來標示左派的立場，並且強力批判不談階級，不談宰制，也不反帝，反倒與資本、國家機器相互輝映的所謂「本土左派」；當然，也曾經被質問「以抽象的左派理論對幾乎所有的台獨或族群論述做全面的強烈批評」。《台社》顯然必須繼續接受左派思想與某種形式的台獨是否有充分銜接的可能性的挑戰，特別是台灣的國家走向、族群論述肯定也會產生變化時，《台社》又要如何面對？內部是否仍然保持一致？

台灣的左派自日據時代以來，根莖不深，又橫遭摧殘，50年代以後更是消滅殆盡。《夏潮》以風中殘燭之勢，延續香火，惜為時不長，幸而《台社》繼之，並且是台灣左翼歷史中最有深度、分量的一份刊物。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台社》自認是異數，或願意與這一歷史脈絡連結？如果願意連結，則《台社》又將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位置與意義？

《台社》以議題延續了台灣讀者對它的關注與閱讀興趣，過去對國族主義、族群論述的適時掌握與回應，為台灣知識界激起一波浪濤，

未來的《台社》仍然必須以創造議題即時回應台灣內部問題為重心，可以說，沒有議題就沒有《台社》，沒有即時回應就沒有《台社》的活力。但是，隨着外在情勢的發展，《台社》必然要思索如何成為華人世界的《台社》，這將是《台社》的進一步任務。

這充分說明《台社》以議題激化討論與反省的強大功能。沒有錯，一百多篇論文的确形成了對台灣社會的部分基礎研究，對現階段的歷史發展也做了紀錄與理解。但是，未來的《台社》仍然必須以創造議題即時回應台灣內部問題為重心，可以

說，沒有議題就沒有《台社》，沒有即時回應就沒有《台社》的活力。

《台社》成功地探索了台灣的地域性問題，但是隨着外在情勢的發展，《台社》必然要思索如何成為華人世界的《台社》，這將是《台社》的進一步任務。

思為網醞 言乃不息

● 黃克武



1963年2月，台灣一群關懷時勢、熱愛學術的年輕朋友，共同創辦了《思與言》雜誌。根據「思與言雜誌社組織章程」，這一份雜誌的宗旨是「從事學術研究，助長文化滋長」。社友們就憑着這一簡單的理想，開創出一個寬廣而長久的學術天地。

《思與言》(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63-)

1963年2月，在《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因「知匪不報」、「為匪宣傳」被判刑十年之後的兩年多，台灣學術界籠罩在一片沉悶的氣氛之中，一群關懷時勢、熱愛學術的年

輕朋友，共同創辦了《思與言》雜誌。早期創辦者有杜奎英、胡佛、許倬雲、張存武、文崇一、朱堅章、袁頌西、楊國樞、李亦園等人，他們多半擔任教職或學術研究工作。根據「思與言雜誌社組織章程」，這一份雜誌的宗旨是「從事學術研究，助長文化滋長」。社友們就憑着這一簡單的理想，開創出一個寬廣而長久的學術天地。

誠如李亦園先生所說的，《思與言》在台灣學術期刊之中是一「異數」。以一個學者們私人結合所創辦的刊物，竟能延續出刊三十八年，不曾中斷，而且至今仍具活力，這其實不僅是一個異數，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迹了。

此一奇迹的出現絕非偶然或天助，而是眾人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三十餘年間，《思與言》不但沒有固定經費來源，也無專職員工。雜誌社的運作完全依賴社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這方面我們不得